

# 德国的经验

——以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法尔克·平厄尔  
(Falk Pingel)

**内容提要** 二战结束后,德国寻求与欧洲国家进行历史和解,尝试与法国等西欧国家以及波兰等东欧国家共同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经过努力,在和解道路上取得了进步。将二战后德国修订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政治框架和条件与1945年后的东亚局势放在一起比较,尽管东亚在过去20年间也出现了一系列就中学教科书开展合作的倡议,为何迄今仍没有出现与西欧相似的发展趋势?值得探讨。

**关键词** 德国 东亚 历史和解 中学历史教科书

2006年5月4日,法国教育部部长吉勒·德罗宾(Gilles de Robien)向公众展示了德<sup>①</sup>法共同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以下简称“德法历史教科书”)。这本常规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采用两种语言,在两个国家(德国和法国)的中学教授同样的内容。这类教材的使用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第一次。其德国版由负责德法关系的联邦特派员、萨尔州州长穆勒(Peter Aloysius Müller)于7月10日向公众公布。<sup>②</sup>该书由一家德国中学教科书出版社与一家法国中学教科书出版社分别发行,并在两国的中学教科书市场上与其他获得批准的教材展开了竞争。目前,该书主要在德法边境地区和双语中学使用。

这本两国共同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诞生,经历了德法双方漫长而广泛的讨论。第一个倡议来自两国的年轻人,他们在一次德法青年交流会议上提出了编写一本共同历史教科书的构想。两国政府积极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委托一个专家委员会制定出框架理念,然后由两家经过招标的私

---

<sup>①</sup> 本文所述及的“德国”指1990年10月3日以前的联邦德国和1990年10月3日统一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包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sup>②</sup> 首先出版的是第3卷,涉及最近的历史,因此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力。目前其他几卷也已出版:Guillaume Le Quintrec et al (Hg.) *Histoire/Deutsch-Französisches Geschichtsbuch*. Vol. 3: *Europa und die Welt seit 1945/L'Europe et le monde depuis 1945*, Stuttgart, Paris 2006; vol. 2: Guillaume Le Quintrec et al (Hg.) *Europa und die Welt vom Wiener Kongress bis 1945/L'Europe et le monde du congrès de Vienne à 1945*, Stuttgart, Paris 2008; vol. 1: Rainer Bendick (Hg.) *Europa und die Welt von der Antike bis 1815/L'Europe et le monde de l'Antiquité à 1815*, Stuttgart, Paris 2011.

营出版社付诸实施。<sup>①</sup> 德法历史教科书是两个昔日敌国在历史教育领域开展合作的典范: 政府、市民社会与私营企业共同参与了这一过程; 作为受众的青少年自身也参与进来; 国家对私营企业进行资助, 但后者必须自负盈亏。

从德法关系的层面来看, 在历史教育领域取得相互理解的结构条件格外便利的。1963年1月《德法友好条约》签订之后, 两国政府定期举行政治协商, 并成立了德法青年办公室以资助两国年轻人之间(特别是中学班级之间)的交流。在历史教学领域的具体合作则跨度更长, 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占领时期。当时, 法国等西欧国家与西德占领区的历史学家与历史教师聚在一起召开研讨会, 商讨如何修正历史教学中遗留下来的敌对图式, 他们也因此为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做出了贡献。早在1951年, 德法中学教科书会议就通过了教材修订的第一份共同建议。从那时起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 这一会议基本每年召开, 目的在于对各自的中学教科书与教学大纲进行相互比较。<sup>②</sup>

接下来, 本文会阐述国际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比较与修订(最早称为“改善中学教材”)所历经的阶段, 这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罪恶进行赔偿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后, 笔者会把二战后德国修订中学教科书的政治框架和条件与1945年后的东亚局势放在一起比较, 从而确定可能导致问题的原因: 尽管东亚在过去20年间也出现了一系列就中学教科书开展合作的倡议, 为何迄今仍没有出现与西欧相似的发展趋势?

### 长期以来的专家工作作为中学教科书的修订奠定了信任基础

我们要特别感谢乔治·艾科特( Georg Eckert) 付出的个人努力。他是一名德国历史教育学家, 战后供职于当时的布伦瑞克教育学院, 是占领时期第一批研讨会的发起人之一。在他的推动下, 德国教育家与学者同昔日敌国同事初步接触, 并在德国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国际教科书研究所”。<sup>③</sup> 自20世纪50年代起, 隶属布伦瑞克教育学院的“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就建立起一个由国内外的历史与地理教师、中学教材编者与大学学者组成的网络。他们以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为目标, 进行历史与地理教科书的修订, 并为此争取各自政府的政策与财政支持。<sup>④</sup> 直到今天, 该研究所仍在有系统地比较德国与其他国家(主要是邻国)的中学教科书当中涉及历史与地理的相互描述, 并为改善这些描述提出公开建议。而为这项研究提供财政与智力支持的机构有: 参与各国的教师工会、参与各国的教育部门、德国外交部以及欧洲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德国同西欧各国开展的中学教科书对话为德国与以波兰为首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就历史教育开展对话起到了示范作用, 双方开始就中学课本中对彼此描述进行

<sup>①</sup> Corine Defrance, Ulrich Pfeil, Symbol or Reality? The background,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ranco-German history textbook, in: Karina V. Korostelina, Simone Lässig( Hg. ) *History Education and Post-Conflict Reconciliation. Reconsidering joint textbook projects*, Oxon 2013, 52 - 68.

<sup>②</sup> Rainer Riemenschneider, Vom Erbfeind zum Partner. Schulbucharbeit mit Frankreich, in: Ursula A. J. Becher, Rainer Riemenschneider( Hg. ) *Internationale Verständigung. 25 Jahre Georg-Eckert-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Schulbuchforschung*, Hannover 2000, 166 - 179.

<sup>③</sup> 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原隶属于布伦瑞克教育学院, 1974年独立出来并更名为乔治·艾科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 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Braunschweig, Germany), 如今该研究所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学会”的成员。本文为行文方便, 将其简称为“国际教科书研究所”。

<sup>④</sup> Falk Pingel, *UNESCO Guidebook on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and Revision*,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71/117188e.pdf>.

沟通。最初的倡议来自社会 特别是教会 这在当时的德国饱受争议。直到勃兰特(Willy Brandt)总理领导的社会自由联盟政府推行了“新东方政策”<sup>①</sup>,才为和解提供了政治前提。德波中学教科书会议于1971年召开,并于1976年通过了相关提议。这些提议集中在对双边关系的描述上。为减少潜在的冲突,由两国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所引发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讨论之外。<sup>②</sup>

尽管双方的中学教科书委员会通常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国家机关对其人员组成也有一定影响,但是委员会在学术和教育领域基本上是自由的。专家经过自由协商提出的建议,对政府也相应不构成约束。国际中学教科书修订是基于双边沟通,由理念和社会讨论来推动,而不是借助来自上层的规定与公告。因此,对中学课本的修改往往是长期的,很少全面展开。事实证明,获取双边信息并通过合作积累经验才是根本,这通常要比立即修改中学教科书的文本走得更长远。构建网络与信任至少在初始阶段要比直接改动中学课本的语句重要得多。无论是在德法还是德波关系中,对中学教科书的年度比较使得相互批评与经验交流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尽管意见分歧与政治批评仍然存在,这样的沟通始终都在进行。双方避免了相互指责,接受了必须做出的政治妥协,尽管这并不总是与事实相符。<sup>③</sup>

### 克服困难取得进步

德国(西德)与昔日的敌对邻国(特别是法国与波兰)达成和解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两项基础之上:一是承认纳粹政权的犯罪属性并甘愿做出经济补偿;二是将西德嵌入西欧——大西洋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二者齐头并进。充分认识纳粹政权的罪行并为此承担历史责任是德国扩大与西欧各国政治经济合作(例如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的必要条件,无论如何也免除不了。<sup>④</sup>

在教育政策这个层面为和解进程做出贡献的是中学教科书对话与学术合作机制(例如历史学家委员会)。不过,中学教科书会议的专家一般不会直接切入最为紧迫且最为棘手的议题,即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与占领政策,他们会首先尝试澄清相关的历史背景。例如,在第一次德法中学教科书对话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扮演的角色构成了讨论的核心焦点;应把中世纪德意志人的东部殖民评价为扩张还是文化移入则成为德波中学教科书对话第一阶段最重要的争论点。当德波会议最终涉及国家社会主义阶段之时,他们考虑到苏联可能会出面干涉,遂把《希特勒——斯大林协定》(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排除在议程之外,并且没有充分讨论战后把德国人从波兰驱逐出去的问题。当时的目标首先是奠定合作的基础,双方通常可以借助共同的欧洲背景找寻到这一基础。说得夸张一点,正如欧洲的组织架构在政治经济领域为解决国家之间的问题提供了框架一样,欧洲传统与欧洲历史认知为平衡存在于历史与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当然,这一过程(特别是德波两国的案例)也伴随着激烈的社会争论。德波中学教科书委员会的提

<sup>①</sup> 1969年,勃兰特出任德国总理后,正式推行“新东方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改善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关系,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愿意以和平方式谋求国家统一。

<sup>②</sup> Thomas Strobel, Die gemeinsame deutsch-polnische Schulbuchkommission—Ein spezifischer Beitrag zur Ost-West-Verständigung 1972—1989, in: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Nr. 45, 253—268.

<sup>③</sup> Falk Pingel, Geschichtsdeutung als Macht? Schulbuchforschung zwischen wissenschaftlicher Erkenntnis- und politischer Entscheidungslogik, i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Memory, and Society* vol. 2, 2010, 93—112.

<sup>④</sup> 有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反思”可参见 Peter Reichelt,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in Deutschland.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NS-Diktatur von 1945 bis heute*, München 2001; Edgar Wolfrum, *Geschichtspolitik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er Weg zur bundesrepublikanischen Erinnerung. 1948—1990*, Darmstadt 1999.

议在两国均饱受争议,在德国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甚至于几个州议会都在讨论是否接受这些提议。但是,委员会的成员并没有因为争论而退缩,相反,他们明确立场并最终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提议。<sup>①</sup>

由此可见,和解的过程绝对少不了反对意见,而且并不总像德国与法国那样,能够以深厚的社会基础为支撑。在战后的那些年里,联邦德国的大多数历史教师与历史书籍作者都不愿公开谈论自己在国家社会主义中扮演的角色,对刚刚过去的历史也缺乏批判。因为他们自己就曾经以教育工作者或士兵的身份参与过纳粹体制,充当过纳粹军队的士兵,也认同其意识形态。尽管自联邦德国成立之日起,对国家社会主义专制的讨论就是官方历史教学大纲的一部分,但是很多教师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在回避这一问题,或只是极为粗略地带过,而不去进一步探讨群体犯罪背后的种族主义动机。罪犯的圈子在很大程度上被紧紧限制在党卫军和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领导层之内,许多人以为国防军并未参与犯罪,战争主要被描述为威胁生存的军事冲突。直到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战争最后几年或是战后的世代步入了职业生涯或者成为大学生,他们开始质疑父辈描述的历史图景。因此,对历史政治教育理念的深入探讨为20世纪70年代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进入20世纪80年代,对历史与社会的描述不再局限于国家机制和领导层,个人的行为方式得到了普遍关注,大家探讨不同政治体制(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下人的行为的可能性,从而使“来自上层”的历史叙事获得了“来自下层”的历史叙事的补充。这一点格外适用于大学与中学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课堂讨论。以往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开脱性描述受到了批评,这成为引发20世纪70年代辩论的重要导火索。辩论的结果是,中学生与大学生直到今天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幅远比过去宽广且层次多样的纳粹专制图景:在反抗者与适应者之外还有广大共同参与者,他们不仅存在于纳粹机构,在国防军、司法界、医疗卫生界等诸多领域都有。特别是发生在占领区的罪行,以往没有人讨论,就算提到也很粗略,如今这已成为关注的焦点。<sup>②</sup>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中学生为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的一个重要领域的历史图景发挥了先锋作用。1973年,联邦德国总统与私立的柯尔柏基金会(Körber-Stiftung)合作,对中学生在历史研究领域的杰出项目进行两年一度的表彰。1982—1983学年的中学生项目主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与“战争年代的德国”,其中涉及被迫在德国进行工农业生产的外籍劳工。这些人的命运在此前几乎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公众对此也所知甚少。尽管盟军在战后审判中提及此事,但它随后就淡出了公众与学术界的视野。重新“发现”这一课题的是中学生,他们设法查阅相关文件并尝试采访从前的亲历者,而地方行政部门与企业对此的反应通常是不理解甚至充满敌意。中学生的多项调查显示,企业对食物供给不足与恶劣的工作条件肯定负有极大的责任。<sup>③</sup>学术界也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这一课题,并从总体上证实并深化了中学生的调查结果。新的研究成果也促使公

<sup>①</sup> Wolfgang Jacobmeyer (Hg.), *Die deutsch-polnischen Schulbuchempfehlungen in der Öffentlichen Diskussio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okumentation*, Braunschweig 1979; Michael G. Müller, The Joint German-Polish Commission for the Revision of School Textbooks and Polish Views of German History, in: *German History*, Nr. 22, 2004, 433 – 447; Włodzimierz Borodziej, Die Gemeinsame Deutsch-Polnische Schulbuchkommission 1972 – 2007, i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Studies, Kansai University (Hg.), Sondernummer *Geschichtsbewußtsein und Geschichtserziehung – Kontroversen um Geschichtsbücher und das Beispiel der deutsch-polnischen Annäherung*, vol. 56, 137 – 152.

<sup>②</sup> Falk Pingel, From Evasion to a Crucial Tool of Mor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y, in: Stuart J. Foster, Keith A. Crawford (Hg.), *What Shall We Tell the Childre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Greenwich, Conn. 2006, 131 – 153.

<sup>③</sup> Dieter Galinski, Wolf Schmidt (Hg.), *Die Kriegsjahre in Deutschland 1939 – 1945. Ergebnisse und Anregungen aus dem Schülerwettbewerb Deutsche Geschichte um den Preis des Bundespräsidenten 1982/83*, Hamburg 1985.

众对强迫劳动的评价发生了转变。今天,许多地方和企业就此课题展开了自己的研究,他们邀请从前的强制劳工出席纪念活动,并设立了纪念场所。1989年欧洲政治开放以后,德国政府与工业界宣布,愿意为来自东欧的强制劳工(此前被排除在经济赔偿范围之外)在德国付出的劳动进行赔偿。为了这一目的,政府与工业界在21世纪初向一个名为“记忆、责任、未来”的基金会注入了100亿德国马克(大致相当于52亿欧元)。该款项的一小部分(3.58亿欧元)留作基金会资本,用于支持德国、以色列以及若干东欧国家的青少年项目。这些项目涉及国家社会主义历史、人权教育以及类似议题。上述事例同样表明:一个具体的赔偿案例可能耗费相当长的时间;若要承认受害者的要求,给予他们公正的对待,总要不断克服来自社会的阻力;并且该事例又一次印证了,若要实现态度与行为的持续转变,市民社会、国家与经济部门必须通力合作。

德国这一态度的转变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同波兰以外的东欧各国(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进行中学教科书对话奠定了基础,这些国家曾在德国占领下饱受摧残。另外,“新东方政策”为内部的政治教育讨论提供了外交政策保障,并且二者紧密结合,互相促进。

“铁幕”拉开以来(此处指冷战结束——译者注),上述工作在边境基本开放与言论自由的条件下继续进行,这证明了过去工作的有效性。如今,德波与德捷中学教科书对话已经开始探讨社会主义时期被排除在外的话题。但是,今天一些东欧国家内部的历史政治讨论仍然主导着对诸如叛国通敌、参与纳粹迫害、在战后驱逐德国人出境过程中滥用暴力等历史的叙述。不过,同属欧洲的共同认知与创造出的交流空间为共同的中学教科书委员会提供了足够的支持,使他们可以成功地提出建议:在各自的教学大纲与中学教科书中,即使是在处理上述议题时也不能进行美化。<sup>①</sup>

### 总结性比较:承认罪责依然是和解的前提吗?

在政治经济领域把德国纳入大西洋——西欧联盟为文化历史领域的接近创造了根本前提,并使德国与其他西欧国家以及美国实现了和解。甚至可以说,政治经济一体化迫使德国完成了和解。尽管如此,这一发展也是分阶段的,并且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部分民众起初对纳粹政权主导的群体性犯罪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并以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为理由,倾向于为自己开脱或者否认罪行。但德国政府仍然在原则上承认了自己的历史责任,并表示愿意提供赔偿。不过,政府避免了对集体罪责的承认,或者说回避了今天经常提出的“道歉”(apology)要求。<sup>②</sup>这样做肯定是想特别照顾到在人口中占多数的战争参与者与亲历者,因为要他们接受这样的举措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新教教会早在1945年10月的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就表示“承认罪责”,并发表声明,发出了“团结起来共同承担责任”的声音。虽然这在德国国内饱受争议,但是在新教教会内部,它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并促成了对德波和解的支持。<sup>③</sup>接下来,迅速发展的东西对抗为联邦德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政治经济利益。1953年8月,联邦德国同东方阵营以外的债权国签订了《伦敦债务协定》,该协定对德国偿还外债问题做出了调整,当时仍在增长的德国债务被大幅度减少或被允许延期到德国统一问题解决之后再偿还。占领状态也随着协定的签署最终宣告结束,联邦德

<sup>①</sup> Thomas Strobel, Robert Maier, *Das Thema Vertreibung und die deutsch-polnischen Beziehungen in Forschung, Unterricht und Politik*, Hannover 2008; Robert Maier (Hg.), *Tschechen, Deutsche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Von der Schwere geschichtlicher Erfahrung und der Schwierigkeit ihrer Aufarbeitung*, Hannover 1997.

<sup>②</sup> Elazar Barkan, Alexander Karn (Hg.), *Taking Wrongs Seriously. Apologies and reconciliation*, Stanford 2006.

<sup>③</sup> Gerhard Besier, Gerhard Sauter, *Wie Christen ihre Schuld bekennen. Die Stuttgarter Erklärung 1945*, Göttingen 1985; 忏悔声明文本详见 [http://www.1000dokumente.de/index.html?c=dokument\\_de&dokument=0131\\_ekd&l=de](http://www.1000dokumente.de/index.html?c=dokument_de&dokument=0131_ekd&l=de).

国由此取得了财政独立。根据协定的精神,西方各国应当在考虑到联邦德国经济能力的前提下,逐一与德国通过双边协商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sup>①</sup>

这与东亚的局势有着本质区别。在东亚,主要的相关国日本、中国与韩国在战后没有被纳入同一个联盟体系。<sup>②</sup>日本最重要的盟国是美国,这一超级强权虽然远离东亚,却以军事介入的方式同时支持台湾地区与韩国,并与中国保持对抗直至20世纪70年代。<sup>③</sup>这种地区态势免除了日本在占领期结束后努力取得两个邻国谅解的外部压力。而且,韩国与中国都在与日本建交之时放弃了大部分赔偿,目的是避免新关系从一开始就被过去的问题拖累。两国期待日本政府至少能够以一份官方谢罪声明来回报己方做出的让步,这一愿望却落空了。在欧洲,对过去的基本谅解与政治经济合作是相互支撑的。在东亚,官方建交的长期推迟导致二战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处理。早在深入研究与探讨战争损失的数额与种类之前,中韩两国政府就丢弃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施压工具。日方的强硬立场导致围绕历史教学与历史教科书内容的官方对话到20世纪90年代都没能举行。这三个国家从不以官方名义参加或只是偶尔参加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中学教科书修订活动,以学术和教育为中心的网络因此没有形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建交以后,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猛烈批评。对日方而言,在平等基础上举行学术对话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因为来自中韩与欧美的学者以及公共媒体都对日本提出了尖锐批评。此外,日本民间的批判声音与官方的教材检定政策形成了对抗。由此可见,日本与德国的情况正相反,不论是在社会内部还是在外交领域都没有形成一个涵盖民间社会与政府的批判主体以增进与邻国的相互理解。<sup>④</sup>

在联邦德国,内部政治力量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在那以前,政府是推动力,它在大多数民众都缺乏认识而且主要倾向于否认个体所应承担责任的条件下,担负起了政治责任,并为纳粹政权造成的损害提供了经济补偿,从而为与昔日敌国的合作创造了外部政治结构性条件。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深入研究纳粹政权罪行,确定个体所应承担责任的内部压力上升,例如针对纳粹罪行的司法审判数量上升,就是这一变化的体现。社会自由联盟政府的“新东方政策”开辟了德国与波兰等东方阵营国家取得和解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政策与市民社会的投入再度相互促进。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投降40周年之际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演讲,他把一直以来的惯用说法“战败”用“解放”<sup>⑤</sup>替代。这说明,人们的历史认识与对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的评价已经发生改变。而德国的再统一又构成了

<sup>①</sup> Hans Günter Hockerts, Claudia Moisel, Tobias Winstel (Hg.), *Grenzen der Wiedergutmachung. Die Entschädigung für NS-Verfolgte in West- und Osteuropa 1945 – 2000*, Göttingen 2006.

<sup>②</sup> 参见以下比较研究: Andrew Horvat, Gebhard Hielscher (Hg.), *Sharing the Burden of the Past: Legacies of war in Europe, America, and Asia*, Tokyo 2003; Masako Shibata, *Japan and Germany under Occup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st-war education reform*, Lanham 2005; John Torpey, Dynamics of Denial: Responses to past atrocities in Germany, Turkey, and Japan, in: Gi-Wook Sin et al (Hg.), *Rethinking Historical In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Korean experience*, Oxon 2007, 133 – 153; Andrew Horvat, A Strong State, Weak Civil Society, and Cold War Geopolitics: Why Japan lags behind Europe in confronting a negative past, in: Gi-Wook Sin et al (Hg.) *Rethinking Historical In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Korean experience*, Oxon 2007, 216 – 234;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Polish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Cambridge, NY 2009.

<sup>③</sup> C. V. T. Rose (Hg.),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Newcastle upon Tyne 2013.

<sup>④</sup> 当前发展概况可参见 Yooshiko Nozaki, Mark Selden, Historical Memory,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Japanese Textbook Controversies in Three Epochs, i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Memory and Society*, Nr. 1, 117 – 144.

<sup>⑤</sup> Ulrich Gill, Winfried Steffani (Hg.), *Eine Rede und ihre Wirkung. Die Rede des Bundespräsidenten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vom 8. Mai 1985 anlässlich des 40. Jahrestages der Beendigung des Zweiten Weltkriegs. Betroffene nehmen Stellung*, Berlin 1986; 演讲文本详见 [http://www.hdg.de/lemo/html/dokumente/NeueHerausforderungen\\_redeVollstaendigRichardVonWeizsaecker8Mai1985/index.html](http://www.hdg.de/lemo/html/dokumente/NeueHerausforderungen_redeVollstaendigRichardVonWeizsaecker8Mai1985/index.html).

一股新的推动力,不在从前赔偿范围内的各国受害群体及其亲属获得了切实的赔偿。

政府的政策与市民社会的推动相互影响,这种机制在东亚国家还没有发展起来。在日本,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记忆方式。虽然有很多私人的或是地方的小型和平纪念馆公开提及日本的侵略与战争罪行(例如强制劳工、强迫卖淫与医学实验),但它们在公众当中的影响力要比设在广岛与长崎的大型官方纪念馆小得多。后者主要是展现日本民众的苦难,表达出一种一般性的反战立场,对日本发动战争的描述却是极为含蓄。<sup>①</sup>相反,中国与韩国则主要关注日本政府代表以及其他高层政治人物的态度,而这些人的态度至少是相互矛盾的。尽管几位首相对日本带给战争对手的伤害表示了一般性的遗憾,却从来没有具体提到战争犯罪的问题。而即便是这样的声明也遭到了其他高层政治人物的反驳或者破坏。例如,示威性的参拜靖国神社总会引起韩国与中国的抗议,这已经成为固定模式。这导致中韩两国民众认为,日本的道歉声明绝大部分是不可信的。尽管日本社会内部存在着反对修正历史认知的潜在力量,但却很难对中韩产生良好影响,因为中韩两国只关注日本政治领导人的举动。另外,虽然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关系十分紧密,但政府之间和民众之间都没有建立起信任关系。相反,当前的领土争端使古老的敌对图式重新复活并再度作用于当前的冲突,导致冲突各方的政治立场更为强硬。过去20年间关于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与文献的双边或三边的项目虽然立意良好,却只是政治影响力有限的专家活动,不足以唤起广大民众的信任。<sup>②</sup>发起共同编写中学教科书活动的主体在三个国家有所不同,大多数活动者来自韩国,主要由积极参与的学者与非政府组织来推动。但是,很多这样的组织至少由政府提供部分赞助,也就不能被视为真正独立。中国方面主要是来自官方研究机构的学者,而日本的专家一般来自左翼或者其他政治光谱,不能代表学术界的“主流”。如果要发挥长远作用而不仅仅满足于取得一般成绩,扩大共同编写中学教科书项目的社会基础显得十分必要。因此在笔者看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人们是否会因为两国或三国的共同编写中学教科书倡议迄今收效甚微而倍感失望,进而放弃进一步努力?还是说这将反过来刺激人们在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付出更为广泛而持久的努力?

(作者法尔克·平厄尔 德国乔治·艾科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前副所长;译者陈琛,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晓娟)

<sup>①</sup> Kazuyo Yamane, *Grassroots Museums for Peace in Japan. Unknown efforts for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Saarbrücken 2009.

<sup>②</sup> 有关东亚中学历史教科书争端及其调解尝试的最新阐述可参见 Steffi Richter(Hg.) *Contested Views of a Common Past. Revisions of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Frankfurt am Main 2008; Gotelind Müller(Hg.) *Designing History in East Asian Textbooks. Identity politics and transitional aspirations*, Oxon 2011; Gi-Wook Shin, Daniel C. Snieder(Hg.) *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Wars in Asia. Divided memories*, Oxon 2011; Un-suk Han, Takahiro Kondo, Biao Yang, Falk Pingel(Hg.) *History Educ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East Asia*, Frankfurt am Main 2012.